

## 論〈桃花源記〉的敘事美學

宋瑩昇

### 【提要】

〈桃花源記〉是陶淵明傳世的名篇，其中構築了一個理想社會，既有儒家嚮往上古之世的淳樸，也有老子宣揚的「小國寡民」社會模式的影子，和當時集權政府造成人民動輒得咎的社會，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歷來關於〈桃花源記〉的大量研究，大都是將其置於散文體式的範疇作為研究對象，似乎錯過了〈桃花源記〉的小說性質。因此，本文試圖假以「敘事學」(Narratology)的小說分析觀念作為切入角度，重新審視〈桃花源記〉的敘述美學特徵，析論以〈桃花源記〉作為小說體裁，仍是一篇在敘事結構上成功的敘事文學。

## 一、前言

〈桃花源記〉是陶淵明傳世的名篇，寫於一千六百年前晉宋易代，戰爭頻仍、社會動亂、人民生活痛苦的時代。陶淵明根據西北人民逃避秦政暴虐的情形，又根據《三國志·田疇傳》記載：「(田疇)遂入徐無山中，營深險、平敞地而居，躬耕以養父母。百姓歸之，數年間至五千餘家」<sup>1</sup>，把他理想中的社會形象表現在〈桃花源記〉裏。在這個理想社會裡，陶淵明用淺顯清淡的筆觸描繪了一個沒有極權政治壓迫、大小權力剝削的樂園，人們過著和平寧靜且自給自足的安定生活。文中虛構的「世外桃源」除了明顯有儒家所嚮往上古淳樸之世「帝力於我何有哉？」<sup>2</sup>的色彩外，再加之魏晉乃至宋初，時人崇尚老莊，高談玄理，倡論放達，陶淵明自然受老子無為恬淡思想濡沫，〈桃花源記〉實亦帶有老子宣揚「小國寡民」社會模式的影子。〈桃花源記〉既是作者依據他的社會理想所作的美好想像，也代表了那個動亂時代的廣大民衆對太平社會的嚮往。

千百年來，讀者對〈桃花源記〉愛不釋手，除了如蘇軾所言「質而實綺，黠而實腴」，用樸素自然的語言風格表現豐富的內容，以及迷離莫測、平中見奇的藝術魅力外<sup>3</sup>，另一個主要的原因就是陶淵明描繪了一幅理想社會的生活圖畫，在精神層次上得以成為苦難現實的寄託，帶給現實人間無限的希望，使自己乃至後來的讀者在精神上跨越時空的限制得到共鳴。這個世外桃源集中地反映了詩人和勞動人民的美好願望，它和當時黑暗的社會現實成了鮮明的對比。毫無疑問，這是詩人對封建社會制度的一種否定，它的進步意義是不容否定的。而儘管這個理想社會或將永遠不可能實現，但它畢竟使人神往，留給人間通往形上世界一條超脫的通道。

〈桃花源記〉本〈桃花源詩〉之序文，依理應以詩為主，序為附。但是因為此序文的文學境界高妙，文學情味雋永，所以千百年來以它短短三百二十字的篇幅，風靡無數讀者，詩序反而比詩更加膾炙人口，詩序為詩大大增輝。陳寅恪說：「陶淵明〈桃花源記〉寓意之文，亦紀實之文」<sup>4</sup>。紀實應是指和當時黑暗的社會現實成鮮明對比而言，而實際上則是以寓意為主，全篇描寫委婉曲折充滿神秘色彩，富有小說氣息。所以〈桃花源記〉不但收在以詩文為主的《陶淵明集》之內，也被收錄在志怪小說集《搜神後記》中。梁啟超先生對此篇評價甚高，並以爲是「唐以前第一篇小說，在文學史上算是極有價值的創作」<sup>5</sup>。

廚川白村曾言：「文藝是苦悶的象徵」<sup>6</sup>，小說作為一種文學體裁，更是反

<sup>1</sup> 盧弼：《三國志集解》（北京市：中華書局，1982年12月），頁329。

<sup>2</sup> 先秦歌謠〈擊壤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於我何有哉？」引自劉大杰：《中國文學史》（台北市：華正書局，1999年8月），頁3。

<sup>3</sup> 謝暉、張伯文：〈淺談桃花源記的藝術魅力與語言特色〉，《龍岩師專學報》1995年6月第13卷第2期，頁112。

<sup>4</sup> 陳寅恪：《陳寅恪先生文集》（台北市：里仁出版社，1981年3月），頁168。

<sup>5</sup> 轉引陳怡良：《陶淵明之人品與詩品》（台北市：文津出版社，1993年3月），頁360-361。

<sup>6</sup> 廚川白村著/魯迅譯：《苦悶的象徵—附出了象牙之塔》（台北市：昭明出版社，2000年7月），

映現實人生的最佳利器。〈桃花源記〉的創作與樂園意識的產生是陶淵明與現實長期拉鋸後的感悟。因此在論及〈桃花源記〉的美學層面時，必先觀察到現實世界所帶給陶淵明的衝擊，因為這些在現實中生命歷程的衝創所造成的折射或反射，才能使〈桃花源記〉深具人文精神的關懷，又富涵文學藝術的深刻美感。

蕭統在《陶淵明傳》裏寫道：「親老家貧，起為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sup>7</sup>記載陶淵明二十九歲時初仕為江州祭酒。但由於「不堪吏職」，時間不長便解職回家。後來陸續做過鎮軍參軍、建威參軍等地位不高的官職，過著時隱時仕的生活。義熙元年(405)陶淵明四十一歲，再次出為彭澤縣令，不過八十多天，便棄職而去，從此脫離了官場。陶淵明之所以如此，並非他對政治原就不感興趣。出身于世代官宦家庭的陶淵明，本也曾期望在仕途中有所進取，在政治上有所作為，如〈雜詩〉：「憶我少壯時，無樂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騫翮思遠翥。」但同時，東晉士族文人普遍企羨隱逸，追求精神自由的風氣，在他身上也留下了深刻的影響。〈歸園田居〉所說：「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之類，就反映了他思想的另一方面。於是兩種彼此矛盾的情結在陶淵明身上互相拉鋸的結果，造成他思想上仕與隱的兩難，人生道路的悲劇性。起初就陶淵明而言，前一種以天下為己任的願望，的確佔據其早期生涯的主導地位。但動亂時代的無情與殘酷，政變與殺戮，不僅給人民帶來災難，同時也造成社會上層份子嚴重的不安全感，這使陶淵明的政治雄心不能不有所消滅。更甚者，在種種權力爭奪之中，道德仁義被扭曲與矮化成為有心人的工具，這使秉性真淳的陶淵明也難以忍受。所以說陶淵明的歸隱，實際是自己的理想與當時的現實無法調和的結果。

由於現實世界的經歷，以及思想的轉變，激發陶淵明提出沒有剝削和壓迫的桃花源的社會理想，對不合理的封建社會表示抗議，於是現實生活的素材乃成為虛構的〈桃花源記〉之基礎，現實如同一面鏡子，在鏡子的另一邊所反射出來的社會形象，便是和真實世界相反顛倒的理想樂園。因此就〈桃花源記〉的創作背景而言，陶淵明以其現實經歷的世界模式，提供了小說創作的素材，藉由現實世界中的戰亂、剝削、階級，而突顯出桃花源世界的和諧、自由、純淨。

而歷來關於〈桃花源記〉的大量研究，大都是將其放至於散文體式的範疇作為研究對象，似乎錯過了〈桃花源記〉的小說性質。〈桃花源記〉廣義而言確實是小說體裁，蕭東海先生說：

「〈桃花源記〉被收入《搜神後記》，並具備同時代小說『粗陳梗概』的基本特徵，其實是一篇小說。作者『拳拳于鬼神』的志趣，是其創作小說的性格基礎。自古來視詩文為正統，以小說為末流的傳統觀念，是誤

<sup>7</sup>王質等撰/許逸民校輯：《陶淵明年譜》（北京市：中華書局，1986年4月），頁251。

將其歸屬於散文的主要原因。」<sup>8</sup>

因此，以〈桃花源記〉為小說體裁，假以「敘事學」(Narratology)的分析觀念，重新審視〈桃花源記〉的敘述美學，是本篇論文重新審視的角度。

## 二、〈桃花源記〉的敘事結構分析

構成小說的基本要素不出故事情節、語言風格、人物形象等，小說做為敘事文之一種，必定牽涉到敘述與結構等問題，以結構主義的方法（包括其理論觀點與假設）來研究小說的一門學問，結構論者稱此為「敘事學」。在〈桃花源記〉敘述時間的發展引領著小說結構的延展迴復，是以〈桃花源記〉在敘事結構上所呈現最大的特徵，乃是多重敘述時空的交疊運用。現茲將〈桃花源記〉全文援引如下：

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為業。緣溪行，忘路之遠近。忽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草鮮美，落英繽紛。漁人甚異之。復前行，欲窮其林。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髣髴若有光，便舍船從口入。初極狹，纔通人。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黃髮垂髫，並怡然自樂。見漁人，乃大驚，問所從來，具答之。便要還家，設酒殺雞作食。村中聞有此人，咸來問訊。自云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出焉，遂與外人隔絕。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此人一一為具言所聞，皆歎惋。餘人各復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數日，辭去。此中人語云：「不足為外人道也。」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處處誌之。及郡下，詣太守說如此。太守既遣人隨其往，尋向所誌，遂迷，不復得路。南陽劉子驥，高尚士也，聞之，欣然規往。未果，尋病終。後遂無問津者<sup>9</sup>。

就〈桃花源記〉在敘事結構上的多重敘述時空現象，或可以概分為「現實軸」、「中介軸」與「幻境軸」三個部分來討論分析。

### （一）現實軸

「現實軸」顧名思義乃肩負著一個故事起合的積極功能，它提供了故事可能真實化的背景；它在敘事文中如墊基般的架構，亦提供文學活動上個人詮釋的虛構行為相對的合理性。而在〈桃花源記〉一文中，虛擬文本中的真實世界，

<sup>8</sup>蕭東海：〈論桃花源記體裁是小說〉，《吉安師專學報》1995年3月第16卷第1期，頁41-44。

<sup>9</sup>龔斌校箋：《陶淵明集校箋》（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12月），頁402-403。



也就是在敘事結構上表現或指涉現實意義的象限，有起頭與結尾兩部分。首先：

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為業。緣溪行，忘路之遠近<sup>10</sup>。

歷來學者對於「桃花源」的追尋眾說紛紜，然而持確有其地而論者，大抵將焦點集中在「武陵人捕魚為業」之「武陵」二字上。並以武陵蠻區的民俗傳說和大量的漢人進入武陵蠻區的事實，歸為陶淵明構思〈桃花源記〉之原始素材。姑且不論跳脫文本以外的「桃花源」之真或武陵之實，單就文本中的真實世界亦即現實軸之敘事時空而言，此即為陶淵明所形塑的第一層敘述時空。

陶淵明藉由武陵漁人的經歷與眼界，將讀者帶至一個充滿神秘色彩而又純樸自然的化外之地，而作者之所以能在平淡精練的語境中營造一種奇想，成為敘述成功的小說關鍵之一，乃是武陵漁人由故事背景的「實」時空，不經意造訪世外桃源的「虛」時空，所引發的戲劇張力。〈桃花源記〉一開始便刻意塑造出一個背景時空「晉」，這是為了沖淡故事的虛構性，也是為引渡出一段奇遇、一個虛時空而必須創作的踏板。再者：

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處處誌之。及郡下，詣太守說如此。太守既遣人隨其往，尋向所誌，遂迷，不復得路。南陽劉子驥，高尚士也，聞之，欣然規往。未果，尋病終。後遂無問津者。<sup>11</sup>

武陵漁人以小說現實之人停留在桃花源虛異之境，回歸現實是必然，於是武陵漁人「得其船」，又從虛時空抽離，重返現實人間。而武陵漁人由虛境回歸實境，此時呈現在讀者眼前的是其機心萌生「便扶向路，處處誌之」，凡夫俗子的舉動。以及現實世界「仕」與「隱」的代表，太守和南陽劉子驥各有「用心」的找尋桃花源行動，此在在都說明現實時空人為的執著與機心、盲目與愚昧。〈桃花源記〉末段故事的收束，雖有退場痕跡，刻意交代故事始終，然作者在敘述結構上設計弔詭的情節，造成武陵漁人來去虛實之間有頭有尾的歷程，最終只能以迷離難解不了了之，作者始終固守其所形塑的現實軸之敘事時空於人世合理性的規範內。

## （二）中介軸

在〈桃花源記〉一文中，中間有如戲劇換場的筆墨，這便是「中介軸」，既不屬現實人間的真實存在，亦不屬於虛幻之境的等同存在，它是兩種時空的交界，是灰色地帶。它存在又不存在，對有緣人而言它是存在，對無緣之人它即又不存在。用神話學的觀念來說，此等洞天福地，便是一種宇宙樹<sup>12</sup>的觀念，

<sup>10</sup>龔斌校箋：《陶淵明集校箋》，頁402-403。

<sup>11</sup>龔斌校箋：《陶淵明集校箋》，頁402-403。

<sup>12</sup>此即《批評的剖析》一書中所言：「……未移用的神啓式的世界與循環的自然世界在某一點

引領著歷險人物進入另一世界的媒介，它的存在只為有機緣的人而存在。其作用不若現實軸提供現實背景，以資敘述結構行進的起始，也未若幻境軸將整個時空凝鑄獨立進而抽離，造成一次情節上的高潮，然而「中介軸」在敘述的鋪展仍是有積極意義的。

忽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草鮮美，落英繽紛。漁人甚異之。復前行，欲窮其林。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髣髴若有光，便舍船從口入。<sup>13</sup>

在小說中身處現實世界的武陵人，是再普通不過的捕魚夫，他象徵現實中所有的凡夫俗子，但他卻因一時之無心無意「忘路之遠近」，意外地「忽逢桃花林」，這時的武陵漁人正由現實時空，被命運引進未知的虛異時空，但也因為此一虛異時空景緻繁麗迷人，武陵漁人才會深陷其中，想一探究竟，而深入究竟的結果，就是燃引小說之「奇」的所在。武陵漁人發現小山口，也就是暗示讀者新天地、新世界、新時空的到來，但要進入這一不同人世的虛時空，勢必要與現實割離，於是武陵漁人做了「便舍船從口入」的動作，他正式走入作者預設安排的虛異時空，開始非既定時空觀念的冒險經歷。就〈桃花源記〉文本而言，「中介軸」是一溝通連貫的系統，不僅在情節上甚至敘述結構上，疏通了現實軸與幻境軸的結構關係，將兩個截然不統的時空產生連結，造成在結構上多重敘述時空現象的可能施行。而「中介軸」本身亦即作者所形塑的第二層敘事時空，「因緣存有」的特殊時空。

### （三）幻境軸

關於〈桃花源記〉文本中的「敘述人」至少有陶淵明、武陵漁人、桃源中人等。而陶淵明之屬的敘述人性質是位於敘記外層、非參與的敘述人，此亦即通常所說的「全能敘述人」<sup>14</sup>，其功能是将現實世界模式引渡至小說虛構世界的「行爲者」。而就〈桃花源記〉故事重點的敘述時空，即「幻境軸」而言，是以武陵漁人及桃源中人兩造的敘事觀點，牽引勾勒出小說虛構世界的全部樣貌，因此，必須藉由深入文本闡述敘述者與故事的敘事時空關係，進而說明虛幻世界桃花源一「幻境軸」的多重敘述時空現象。現茲將〈桃花源記〉「幻境軸」全文援引如下：

初極狹，纔通人。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

上攜手聯合，而這個點之象徵性的表現，我們稱之為顯靈點。」諾思羅普·弗萊著/陳慧、袁憲軍、吳偉仁譯：《批評的剖析》（天津市：百花文藝出版社，1998年）頁248。

<sup>13</sup>龔斌校箋：《陶淵明集校箋》，頁402-403。

<sup>14</sup>高辛勇：《形名學與敘事理論——結構主義的小說分析法》（台北市：聯經出版社，1996年），頁140-142。

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黃髮垂髫，並怡然自樂。見漁人，乃大驚，問所從來，具答之。便要還家，設酒殺雞作食。村中聞有此人，咸來問訊。自云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出焉，遂與外人隔絕。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此人一一為具言所聞，皆歎惋。餘人各復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數日，辭去。此中人語云：「不足為外人道也。」

15

武陵漁人通過山口，由現實之境步入虛幻之境，眼前所見的世界是「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這便告訴讀者，由先前的桃林到眼前的良田美池，都在在說明虛幻時空的美好動人：土地肥沃、作物豐榮、交通便利、人事和樂。而且桃源中人見到武陵漁人的反應是極其和善與歡迎：「便要還家，設酒殺雞作食」，顯現的是人性中最真誠美善的一面。就敘述結構的作用而言，「幻境軸」相對於「現實軸」而有大量化、精緻化的敘述，主要在於產生一種對比效果，凸顯陶淵明所形塑的第三層敘述時空，虛幻世界的美好。

〈桃花源記〉中另一組敘述人是桃源中人，在推動故事情節的功能上，主要是突顯虛幻時空的獨立性與完整性。桃源中人第一次進入讀者的印像是「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黃髮垂髫，並怡然自樂」，充分說明虛幻世界人物的和樂形象，恰如其份地反應出一個自然純樸社會。而桃源中人自言：「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出焉，遂與外人間隔。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不僅交代自我的出身與來歷，更使讀者在進入虛幻時空之後，有現實歷史的背景作為襯底與比較，引起讀者企慕理想桃花源的不染紅塵。本來由武陵漁人因為身處不同空間而有不同時間各自獨立的敘述時空，在桃源中人自言來處後正式將三層敘述時空揉雜，使讀者在面對時間這個有著連貫性的歷史感知觀念時，自然接受作者敘述結構上的安排。這種多重敘述時空的發生，由本來各自獨立轉而同時並存連結，即是〈桃花源記〉在謀篇上回環往復的特殊魅力，因而成就三言兩語如斯，卻能在情節上出人意表，在結構上井序有致，作為一篇成功的小說體式。

桃源中人自身所處的時空，是一獨立的時空，即使因武陵漁人的無意闖入也並不切斷其獨立性，它自足自在的完整性並不因此而改變。所以當武陵漁人要離開之際，「此中人語云：不足為外人道也」，即是對虛時空的獨立性與完整性所下的註腳，但武陵漁人畢竟是俗人，無法遵守約定的結果，注定他無緣再入桃花源，也切斷人間與理想樂園可能且唯一的聯繫因緣。對於武陵漁人而言他是進入一個虛異時空，因為有其自身現實世界做比較，所以他是新奇與嚮往桃花源。但就桃源中人而言，其自身所處的時空即是實存實有的現實空間，並

<sup>15</sup>龔斌校箋：《陶淵明集校箋》，頁402-403。

不因爲外來的武陵漁人以爲奇異而便得奇異。但不得不承認的是，桃源中人所處的時空，由於其獨立性與完整性，是以造成敘述上的神秘色彩，虛異性仍是存在，虛異時空亦存在。

若無比較，也就是沒有武陵漁人從中溝通小說中的現實世界與理想桃花源，便無所謂時空交錯，虛實並存的敘述問題。但由於武陵漁人的經歷，兩層世界的確實有過交流，是以〈桃花源記〉在敘述者與故事的敘事時空關係上，作者是以武陵漁人虛實之間的奇異經歷作爲敘事主線，再輔以桃源中人所處時空的獨立與完整作爲佐線，創造了多重敘述時空現象的敘事結構。

### 三、〈桃花源記〉的敘事美學特徵

〈桃花源記〉全文三百多字，筆法疏淡，語言簡約，看似輕描淡寫，實則大筆淋漓，無論是寫武陵漁人進出桃花源的經過，還是理想社會的圖景，無不寫得生動傳神。而〈桃花源記〉之所以有這樣風貌的呈現，主要還是歸功於其敘事上的回環往復，結構上的嚴謹完整。換言之，即是有以下的敘事美學特徵相互發揮，陶淵明才能通過對現實世界的省察，營造出一個虛實相交，富有典型文化意涵的理想環境。

#### （一）虛實交涉的時空隙縫

誠如上一節所言，〈桃花源記〉在敘事結構上所呈現最大的特徵，乃是多重敘述時空的交疊運用，而非單一敘述時空交疊運用的結果，便產生虛境與實境交相指涉、交相融合，於是小說中的時空隙縫也就應運而生。因爲在敘事美學上時空隙縫營造的成功，使得相對於現實人間的理想樂園，不是那麼遙不可及，卻也飄然塵外，這使讀者在進入〈桃花源記〉時對時空感知的衝突性與矛盾性大大削減，也就是說虛實交相指涉產生的時空隙縫，引領讀者自由進出小說中的現實與虛幻，突破時間與空間差異的限制性。

桃花源是陶淵明子虛烏有所虛構出來的理想世界，但他卻在一開始便點明確切的時間與真實的人物：「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爲業」，就本質及本意上陶淵明的確是有刻意調和虛實的取向。接著〈桃花源記〉又云：「緣溪行，忘路之遠近。忽逢桃花林」，在處理時空觀念上，陶淵明用「忘」、「忽逢」鮮明且深刻地呈現時空的不穩定與不可測知性，已然將現實既有的時空觀念漸漸消抹，並往虛異的時空象度靠攏。船對於武陵漁人是再現實不過的生活工具，船代表著現實世界的最終象徵，透過武陵漁人「便舍船」、「得其船」的一系列動作，虛境與實境在其中交遞變化，時空隙縫的可塑性即是在簡單的上下船活動中圓滿完成。而武陵漁人在進入桃花源之後身處的空間是：「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與現實之境無甚差異，讀者目光僅只注意武陵漁人遭遇事件之奇，並不自覺敘述時空的改換，虛實交相指涉渾融

無跡。再者桃源中人自言：「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出焉，遂與外人間隔。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既言「與外人間隔」，復言「不知有漢，無論魏、晉」，在虛異時空中嵌入一段真實性的歷史背景，令人虛實莫辨。最後結尾用在《晉書》中有傳記載的南陽劉子驥作總結，說他：「聞之，欣然規往」，以一個在現實歷史出現的人物相信桃花源虛異時空的真實性，加強小說中時空隙縫虛虛實實的迷離神秘色彩。然而劉子驥的「未果，尋病終。後遂無問津者。」也說明了武陵漁人乃至一切皆回歸現實，即使前事經歷的時空親切熟悉如現實世界的時空，但仍是虛幻無尋跡的，虛實的交會點由此分岔開來，時空隙縫不復出現。在小說的敘述結構：實境——幻境——實境，的整個佈局過程中，武陵漁人「便舍船」、「得其船」的動作，是作者巧妙的佈置，船是引渡，同時也是現實世界的最終象徵。它漂浮在如夢似幻的煙波上，維繫著此岸與彼岸——現實（真實時空）與理想（虛幻時空）的聯繫。

〈桃花源記〉裡虛異時空的變化大體等同於現實時空的變化，但這裡所言的時空變化，並不是指虛異時空與現實時空的步調一致，而是說讀者在感知虛境與實境時空的進程變化時，只有自然時序的改變，並無明顯的虛實時空對立，這也是虛實交相指涉產生時空隙縫的結果。就邏輯而言，桃花源的虛幻性必定造成其時空的虛幻，是非既定時空觀念的，而現實世界的時間規律是一成不變，兩者在時空中必有差異，但由於敘事美學上時空隙縫營造的成功，在時空軸上便不出現如〈爛柯山傳說〉，或日本〈蒲島物語〉故事，人物於出入虛實之境後因時空差異所造成的改變。

## （二）武陵漁人的「契約」效應

在生活和藝術中「契約」不僅僅得以建立和撕毀，它們也被履行或完成。契約通常來自於一種互動關係，而由契約訂定所產生的效應，明顯影響著事件取捨、偏向的最終結果。在普洛普和葛雷瑪斯所考察的作品中，一個契約通常是英雄和一種更強大的力量之間的一種交易，因此英雄是收到人，另一個人物（國王、上帝、父母、神父）則是發送人。這種等級關係是重要的。經由此等對比關係的發送，任一契約的存在才有其實質意義，履行或撕毀契約的結果也才有值得討論的空間。這種契約關係，牽扯到一種更強大的力量所制定的一個或一套規則，附帶懲惡揚善的許諾。這些規則可以明確地或含蓄地由上帝、社會或任何個人制定，只要這個人擁有獎和懲的力量。由此可見，契約不僅要求主語（英雄）去履行它，它也要求建立了契約的那位權威（人物）履行它。任何基於這個契約之上的考驗，必須在這兩者之間進行<sup>16</sup>。因此，敘事單位以「契約」產生故事的矛盾、高潮、衝突、悲喜劇，製造故事的戲劇性張力。

契約效應在〈桃花源記〉中的呈現，可概分為「理想之約」及「現實之約」兩部分來探討。武陵漁人在無意間涉足桃花源，並在其間做客後，「此中人語云：

<sup>16</sup> 羅伯特·休斯著/劉豫譯：《文學結構主義》（台北市：桂冠圖書公司，2001年1月），頁122-123。



不足爲外人道也」，其與桃源中人的約定是「理想之約」，即是與理想世界的契約。而這個契約存在的可能，雖是起源於一種機緣，一段偶遇，但就意義層次而言，與理想世界的契約，既是對理想世界的溝通嚮往，亦是形而上精神昇華的約定。再者就「現實之約」而言，武陵漁人自身與現實世界的牽繫，是一種與生俱來的同體感，其對於現實世界的自然歸屬感，便是現實之人與現實世界所締結的契約，這種人類潛意識中區分他者排外的執著，是無形中形成也割捨不去的契約。這種與現實世界所締結的契約，雖不意察覺但作用力極大，因爲現實世界是建立在社會與個人的等級關係上，社會化的過程即是契約締結的過程。所以對武陵漁人而言「理想之約」是新契約，「現實之約」是舊契約。但由於陶淵明所創造的〈桃花源記〉是虛實兩相拉鋸的世界，一開始便注定了新舊兩造契約的衝突；而武陵漁人也並非英雄形象，在人物性格上一開始便有瑕疵性，結果是「理想之約」履行的困難。所以〈桃花源記〉裡人物形象標舉的「契約」效應，是理想世界不復存在的悲劇。

對於武陵漁人這個溝通現實與理想世界平凡的中間人而言，因爲他終究是凡夫俗子，一但步出了桃花源遭受濁世之風的薰炙，現實的種種私慾便再度浮上心頭，所以「理想之約」與「現實之約」兩造契約效應，在他身上衝突拉鋸的結果是：「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處處誌之。」這時武陵漁人已忘卻與桃源中人的約定，而選擇向他歸屬感較大的現實社會靠攏。而背棄撕毀「理想之約」的結果，便是「太守既遣人隨其往，尋向所誌，遂迷，不復得路。」永遠失去再探理想國桃花源的機會。總歸而言，新舊契約衝突的造成，是因爲現實人間與理想桃花源的價值觀不同，道德情操各異，一個是世風澆薄的社會，一個是民風純樸的社會，二者存在根本上的差異，幾無協調包容的空間。所以未能履行「理想之約」的凡夫俗子，終究是不能超昇現實，也就不可能成爲理想桃源中人。

### （三）張力的加強：重複「問津事件」

小說作爲敘事文體之一種，關於敘述上重複現象的運用，重複的頻率又如何等，有著其美學上的特殊意義，其造成敘述上的往復迭宕或事件的概括性強調，以及結構上的再加強。簡而言之，頻率即是：故事一特定事件發生的次數跟它敘述的次數的比較。一種頻率是否產生強烈的重複效果，取決於事件的性質以及對它的注意力的大小。「事件越平庸，重複就越不引人注目」，大體上可作爲一條準則<sup>17</sup>。

〈桃花源記〉中真正進入理想世界的敘述只發生一次，起先武陵漁人由「忘路之遠近」的無心，而「忽逢桃花林」進入一處人間仙境。這種天外飛來一筆的寫法，有新奇的效果性，但在情節的敘述上作爲小說就略顯單薄且結構鬆散，而爲了彌補這樣的不足，陶淵明很有技巧性地以「對理想世界的追尋」這一主

<sup>17</sup>米克·巴爾著/譚君強譯、萬千校：《敘述學：敘事理論導論》（北京市：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年11月），頁87-90。



題作為統攝整個故事發展的重要線索，再重複敘述二次沒有結果的「問津事件」，使得故事在邏輯的合理性、情節的完整性上都得到完滿的解決。而使得讀者在進入陶淵明虛構的文本世界中時，除了能領略文中之奇，亦能有理可尋理想世界幻滅性之必然。是以，陶淵明寫武陵漁人離開桃花源後「得其船，便扶向路，處處誌之。」是爲了引領第二次「問津事件」的重複：「太守既遣人隨其往，尋向所誌，遂迷，不復得路。」更藉由南陽高士劉子驥「聞之，欣然規往。未果，尋病終。」引出「後遂無問津者。」斷然止住情節的再發生，作為故事的結局。這樣重複「問津事件」的敘述手法，雖然在目的上都是未完成、沒也結果的追尋，但由發生過一次真正進入桃花源敘述經歷的再追尋，在敘事上已然產生強烈的重複效果，深刻說明主題現實世界終究無法滲透理想世界，現實之於理想的追尋必定走向幻滅，於是〈桃花源記〉敘述上重複「問津事件」的意義也就在此。

就通篇〈桃花源記〉而言，找尋理想桃花源，也就是「問津」，乃是作為貫串小說情節推演的中心線。所以小說中藉由「問津事件」的重複敘述，不僅在量上可以擴充〈桃花源記〉「粗陳梗概」的質感；在質上也因「問津事件」量化的推演，彌補情節敘述上的不足，造成量化的戲劇性。

#### 四、結語

由「敘事學」的小說分析觀念再出發，審視陶淵明的不世名篇〈桃花源記〉，除了再次肯定陶淵明在文學史上無可抹滅的地位外，更藉由西方文學理論的檢驗，給〈桃花源記〉下一個更全面性或更實至名歸的註腳，無論是作為散文體式或小說體裁，〈桃花源記〉在文學的敘事結構美學上，都是一次幾近完美的示範。

〈桃花源記〉在浩如煙海的文學之流中，以其獨特的敘事美學，構築了一處人人嚮往的理想境地，即使眾人明知其虛幻且不可爲，但受其藝術魅力的鼓動，無數的心靈仍將現實未能滿足的希望，寄託在永生可以追求的理想層次，生命因而昇華。〈桃花源記〉在敘事結構上陶淵明把握虛實相表裡的反覆辨正、多重敘述時空的交疊運用，進而在敘事美學特徵上營造出「時空隙縫」、「契約效應」、「張力的重複」。換而言之，若無強烈的現實感作為基礎，理想桃花源的可貴性便無法顯現，是以在體裁結構或中心思想上，陶淵明以其現實生活的深刻體驗，直指心靈的投射，反覆辨正人類生存世界的荒謬，間接雕塑出一個理想世界。由陶淵明肇始的「誤入桃源」故事，隨著時間與空間的遞嬗替換，世外桃源的樂園意象，已然全面滲入後世文學，多元輻射成各種層次意涵，無論是神仙化的轉換、隱逸化的寄託、個性化的詮釋、世俗化的幻滅或者情色化的墮落，主動或被動地影響著作家的心靈與個性。

## 參考書目

### 一. 專書

- Elizabeth Dipple 著、林怡俐譯：《情節佈局》，台北市，黎明出版社，1973年5月。
- 陳寅恪：《陳寅恪先生文集》，台北市，里仁出版社，1981年3月。
- 王質等撰/許逸民校輯：《陶淵明年譜》，北京市，中華書局，1986年4月。
- 特里·伊格爾頓著/王逢振譯：《當代西方文學理論》，北京市，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年6月。
- 陳怡良：《陶淵明之人品與詩品》，台北市，文津出版社，1993年3月。
- 米克·巴爾著/譚君強譯、萬千校：《敘述學：敘事理論導論》，北京市，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年11月。
- 高辛勇：《形名學與敘事理論——結構主義的小說分析法》，台北市，聯經出版社，1996年。
- 諾思羅普·弗萊著/陳慧、袁憲軍、吳偉仁譯：《批評的剖析》，天津市，百花文藝出版社，1998年。
- 龔斌校箋：《陶淵明集校箋》，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12月。
- 歐麗娟：《唐詩的樂園意識》，台北市，里仁書局，2000年2月。
- 廚川白村著/魯迅譯：《苦悶的象徵—附出了象牙之塔》，台北市，昭明出版社，2000年7月。
- 羅伯特·休斯著/劉豫譯：《文學結構主義》，台北市，桂冠圖書公司，2001年1月。

### 二. 期刊論文

- 劉自齊：〈桃花源記與湘西苗族〉，《學術月刊》1984年第7期。
- 高黎明：〈試論陶淵明桃花源理想的社會根源〉，《昭通師專學報》1986年第1期。
- 謝暉、張伯文：〈淺談桃花源記的藝術魅力與語言特色〉，《龍岩師專學報》1995年6月第13卷第2期。
- 蕭東海：〈論桃花源記體裁是小說〉，《吉安師專學報》1995年3月第16卷第1期。